

国际主义和战争

卡尔·考茨基著

(供内部参考)

0143

28

国际主义和战争

（德） 恩格斯著

（国际主义和战争）



国际主义和战争

卡尔·考茨基著

許长卿译 何疆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Karl Kautsky
**Die Internationalität
und der Krieg**

Buchhandlung Borwärts Paul Singer G. m. b. H.
Berlin 1915

国际主义和战争

〔德〕卡尔·考茨基著

許长卿译 何疆校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

1963年11月第1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3002·106 定价(七)0.23元

印数 0.001—2,000

出版者說明

考茨基这本小册子，写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原載《新时代》杂志，一九一五年初以单行本作为《新时代》丛刊在柏林出版。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以第二国际領袖的身分所写的一系列反馬克思主义文章中比較重要的一种。

在这本小册子里，考茨基竭力为第二国际各国党在这次大战开始以来墮落为社会沙文主义的事实辯解，否认第二国际已經破产，鼓吹階級和平，宣揚了一整套列宁称之为“空前的詭譎、虛伪”也是“最典型的”机会主义謬論。考茨基宣称，社会民主党人主張“保卫”祖国，“偏袒本国政府”，并不違背国际主义原則。

按照考茨基的說法，在战争期間，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并沒有一条明显的界綫。他說：“对于群众來說，最明显的、最直接的和最迫切的事情是保卫他們的生命和生命的源泉。如果現代无产階級的国际主义同这种保卫无法一致，那末国际主义的情况就糟糕了”。战争使“一切都顛倒过来了”，由于“惧怕敌人入侵，……大家首先都成了爱国者，連抱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人也如此”。“国际爱国主义在其实践中是很难同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区分开的”。

考茨基閉口不談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的、反无产階級的性质，而把它描繪成好像交战双方都是民族自卫的战争，他列举了从一八五四年克里木战争以来国际上几次民族战争的“实例”，來說明这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偏袒”早有先例，并不特殊。他說：“几乎沒有一次战争不使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一方或那一方表示偏袒，而且常常是热烈的偏袒，几乎沒有一次战争不同时引起社

會民主黨人中間的重大分歧。但是從來沒有人想到，把這種偏袒看成是違反國際團結的誠條或者看成是贊成戰爭”。他一再強調，在戰爭時期，情況太複雜了，誰是誰非，很難分清，產生意見分歧是難免的，大家應該忍耐，應該等待。他說他的“這篇文章就是勸告人們要忍耐，幫助人們估計在戰爭問題上的困難……”。

考茨基說，“人們可以從這個或那個立場出發，然而都決定作同樣的偏袒，即支持本國政府。其區別在於：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說，這種結果从一开始就無需任何考慮就肯定為天經地義，反之，對於國際主義者來說，這却是關於戰爭結局對國際無產階級所可能產生的種種後果加以權衡的結果”。但是這種權衡“往往是在入侵恐怖的威脅下”作出的，加上一時情況不明，因而即使是“國際主義者”也難免要“支持本國政府”。在考茨基看來，這是合理合情，沒有什麼好指責的。他教訓別人說，有人在情況還沒有弄清之前就指責別人違背國際主義，甚至“今天就宣告‘國際’破產，為時未免太早了！”

考茨基故意抹煞國際上存在着的階級鬥爭，說什麼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原則只適用於和平時期。他說，在戰爭中，“那個在平時如此有把握地起着決定作用的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原則，現在却被掩蓋了和模糊起來了”，“戰爭使階級鬥爭退居次要地位”。又說：“戰爭不是階級之間的鬥爭，而主要是政府之間的鬥爭。”因此，在考茨基看來，作為無產階級的國際階級組織的第二國際，當然也就無能為力，不必有所作為了。他一再要大家看到將來的“和平”遠景，看到“國際”在和平時期的“威力”，而不要埋怨它目前不起作用，也不要認為它放棄了原則。他說：“戰爭對我們所提出的那些問題的新奇性、複雜性，甚至看來常常是錯亂性，並不意味着對我們在和平時期的策略原則的修正。”他認為“‘國際’在和平時期是強有力的，而在戰爭時期是最軟弱的”，“‘國際’在戰爭中不是一個有效的工具，‘國際’主要是和平的工具”。只要一旦實現和平，“國際”就能立刻“發揮其全部力量”。

考茨基最后号召大家：“在战争的种种误解、混乱、偏袒和灾难中”，在“热烈关心国家繁荣”的同时，“要永远重视国际团结，不对国际团结产生任何怀疑”；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来完成“国际”的伟大历史任务：“为和平而奋斗，在和平中进行阶级斗争”。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以及《社会主义与战争》、《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等文中，针对当时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这类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指出他们“是在欺骗工人，他们重复各国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谎言，竭力想把这场帝国主义的、争夺殖民地的、掠夺性的战争描绘成人民的、自卫的（对于任何一方都是自卫的）战争，并从历史上找出非帝国主义战争的实例来自圆其说”，认为“只有毫无社会主义信念、毫无社会主义良心的人，才会看了这种论据‘信以为真’，才能不把它们称为空前的诡辩、虚伪和对社会主义的糟蹋”！列宁指出：“这些领袖们的转变，不能叫别的，只能叫做叛变”；“工人阶级若不无情地反对这种没有气节、实行叛变、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作用。”（《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86—187、291页）

这个中译本是根据柏林保尔·辛格前进出版公司一九一五年德文版译出的。

目 次

序 言	1
一 国际主义和中立	5
二 党在战争期间的分歧	7
1. 从一八五四年到一八六六年	7
2. 一八七〇年	12
3. 一八七〇年以后	19
三 和平的矛盾和战争的矛盾	21
四 布尔战争以来“国际”的一致	25
五 目前形势的困难	29
六 入侵的恐怖	32
七 “国际”面临的危险	34
八 “国际”的限度	37

序 言

本文最初发表于《新时代》杂志。我的一些朋友要求我使更多的讀者能看到这篇文章，因此我現在把它印成小冊子发表。不言而喻，这些朋友們并不要求对这里提出的問題詳尽无遺地加以論述。只要考虑到战争状态，目前要这样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想把問題論述得尽量簡單明了的那种願望，还使我避免去作任何会使問題复杂化的論述。例如，一般地，凡在沒有特別加以区别的地方，我都把現代国家理解为民族国家，这对于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是适用的。在多民族国家里，情况就不那么簡單了，对于这类国家來說，这里所說的有些东西应另加区别。但是在不同的多民族国家里，情况是如此的不同，以致我认为，用簡單几句话來說明这种区别似乎是一项几乎无法解决的任务。

考虑到战争状态，我也根本沒有在这里进行論战的意图。我倒想着重指出本文中所援引的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李卜克內西給布拉克信中的几句话（第24頁）。他号召他的同志們說：

“要忍耐！……必須不惜任何代价来消除（党內的）分歧，至少要避免公开爆发分歧。在像目前这样的时刻，党内不應該发生那种看起来像是不一致的现象。”

尽管李卜克內西当时如此地嘲笑各个政党之間的国内和平，可是他却认为党的内部休战是迫切需要的。

我要把这个思想称为我的这篇文章的主导思想。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傳播这个思想。

当然忍耐对于各党各派來說都是同样适用的。但是并不就應該使反对派一声不响，甚至于在国内和平的借口下使它拋棄在战

爭爆發時所採取的立場。這並不是威廉·李卜克內西所要求的這種做法，即避免發生凡是“看起來像是不一致的任何現象”。

卡爾·李卜克內西同志認為有必要在表決時與他的議會黨團的全体其他議員公開分裂；如果這種做法是令人遺憾的話，那末，無產階級運動的一個機關刊物對那些深信戰費案本該被否決的人們公然硬加上他們未曾懷有的動機，那就更加令人遺憾了。誰都不想用這種否決來表明：他對於敵人軍隊會不會把戰爭破壞帶進他的國家這一點是無動于衷的。人人都只害怕要對將戰爭破壞帶到別國去這一點負責。人人都只是想用否決戰費案來更斷然和更明顯地推卸戰爭責任，即比用議會黨團聲明的方式更斷然和更明顯些。

對於被要求通過的戰費案加以否決，這是否是這方面最適宜的途徑，人們對此還可以大加爭論。但是人人都認識到，目前並不是解決這個爭端的適當時機。因而人們就更應該防止將議會黨團內少數人的動機在輿論界里加以歪曲。

在不能率直進行討論的目前時刻，不僅是在本國的黨內迫切需要忍耐，而且在整個“國際”中也是如此。“國際”的作用越是因戰事而中斷，戰爭越是不僅在資產階級中而且也在工人階級的行列中產生了民族仇恨的傾向，各國社會主義報刊就越應該堅決反對這種傾向，並且謹慎避免一切可能促進這種傾向的事情。這些報刊尤其在對外國兄弟黨和同志們進行批評時必須尽可能地小心謹慎。無論如何，人們尤其不應該惱怒地把自己所犯的罪孽推到外國兄弟黨和同志們的身上，——在我們國內和國外都有人犯這種罪孽。

與敵人親手交鋒的戰士，他們學會重視敵人同時又不使作戰的直接目的因而受到影響。但是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應當看得更遠一些，越過我們眼前的事情，越過戰爭而看到和平時期。正如我們黨的議會黨團的聲明中所說過的那樣，我們要一個“能與鄰國人民保持友好的和平”。這種友好不僅取決於諸政府間所締結的和約的

形式，而且同样也取决于两国人民互相表示信任和尊重。那些站在“国际”立場上的报刊的最高尚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不顧种种战争矛盾而保持这种信任与尊重，以便从自己这一方面作出贡献，促使和約一旦在形式上締結也在实际上能到处充分發揮其作用。如果恰恰是参加“国际”的各党在各国軍隊締結和約之后內心里想要繼續进行各国之間的战争，那就意味着对我们所宣傳的世界和平思想最恶毒的諷刺。如果各国的党报对兄弟党不力求保持最大的慎重和忍耐，那末我們就会面临这种危險。

如果李卜克内西一八七〇年要求党内彼此忍耐，那末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想要避免明确表示态度。他也許是最不想避免表示明确态度的人。他之所以提出这种要求是由于战时特殊条件的緣故。

一八七〇年有效的东西，今天應該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因为，当时的批評和意見交流，远沒有像今天这样受限制。今天，在发表关于战争的不同意見时，至少有一方是很受限制的。在那里，任何分歧都太容易被降低成关于細節和个人問題的爭吵，这种爭吵只能引起怨恨和反感，而不能产生任何澄清。

对于外国來說，还有广泛的交通限制，它使我們对于兄弟党內部情况的了解很不完全，很片面。

但是有一点是首先要考虑的：战争使我們在各国都面临着不可調和的諸种义务的冲突，而这些义务中的每一项义务都需要同样得到充分考虑，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战争已把各交战国的社会主义者引到錯誤立場上去了。不管我們做什么——并且即使我們什么也不做，我們的態度无论如何也决不会是十全十美的。恩格斯在他最近常被引用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已經看出了这一点（《新时代》第十卷，第一期，第580頁起）。虽然他以簡單得多的形式預見到今天爆发的战争，但是他仍然难以从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場来决定贊成交战国的哪一方。他得出結論：“因此，各国社会主义者都是贊成和平的”。

現在戰爭畢竟来到了，从而就有必要作出決定。我們每个人自己愈难作出決定，我們就愈應該尊重別人的決定。我們进行国际間的論战，比在本国内部进行論战还更缺乏理由，所有参加者都更缺乏可靠的依据和言論自由。

这当然只指分歧的“公开爆发”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党的同志們就應該无批判地或者不加思考地忍受一切发生的事情。目前，輿論界不是进行論战的場所。但是正因为如此，同志們都更應該把戰爭所提出的一切問題独立地进行思考和研究，并且在亲密友人的範圍內加以討論，以便在可以公开談論和作出決定的时刻重行到来时能够提出一个經過深思熟慮的主張。

我的这篇文章除了劝告人們要忍耐、帮助人們理解在戰爭問題上的各种不同見解、同时也帮助人們估計在戰爭問題上的困难之外，还試圖对于上述的那种探討和考虑同样也給予一些鼓励。但是我的最强烈的願望是：这篇文章不久就能由于和平而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論。和平将結束軍隊之間的斗争并且使階級斗争又能充分发挥作用，直到无产阶级能通过实行这样一种生产方式而結束一切战争危險为止；这种生产方式将結束社会分为对立階級的状态并且終止国家之間的利害冲突。

考茨基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

一 国际主义和中立

不同方面都硬說，甚至个别党内同志也硬說，社会民主党在目前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关于这次失败的本质，我們的这些批評家們的看法当然不是一致的。有些人认为我們的綱領和策略已证明是錯誤的，党应当“重新确定方針”。又有的人认为，我們的綱領和我們的策略原則是正确的，但是党在战时的实践背离了它們。

关于这一点，人們在战后还会有好多話要說，如果有可能公开进行討論的話。但是，现在就指出上述那些批評根本沒有被普遍心悅誠服地接受，这也許不算是廢話。

事实上，确实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們党要重新确定方針。战争的爆发并不意味着我們理論观点的**破产**，而是**证实**了这些观点。因为正是这些观点才使我們認識到世界大战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必要性，如果大国的世界政策沒有改变的話。如果欧洲列强接受了国际社会主义所主張的政策，在我們这一代就还可以避免世界大战。在媾和时这个政策的精神越居上風，那末就可望使和平成为越合理和越持久。

我們没有什么可以后悔，也没有什么可以改正。我們觉得我們直到战时所一直主張的观点已得到了肯定的证实。

更严重的是与此相反的这种責难：即不是說我們基本观点的主要部分是錯誤的，而是說在我們的行列中有許多人在战争爆发以后放棄了那些据說是正确的主要基本观点。各交战国的同志們的态度据說是与国际團結的原則不相容的，据說已扼杀了国际协会。

关于这一点，我們也必須把討論推迟到战争結束以后再进行，如果这种討論涉及个别的具体情况的話。但是展开一次純理論性的討論，一次不涉及某一特定国家而是从所有的資本主义大国的—般情况出发的純理論性的討論，在現在是可以有助于消除某些誤会和減輕某些磨擦的。

有人硬說，“国际”已經不起作用了，因为它未能制止战争。这些严厉的批評家要求“国际”做这样一件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沒有人做过的事情：一个还太軟弱得不能取得政权并且不能决定各国政策的政党居然就該有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防止这个政策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至于另一个关于在战争中不偏袒任何一方的要求（我們想在—下文中詳細論述这个要求），情况就不是这样簡單了。有人硬說：誰以国际主义为理由而反对战争，他在战争爆发以后就不應該偏袒这一方或那一方。因为据說这就会意味着承认战争，意味着違反了对各民族一視同仁地加以尊重并且譴責对其中一个民族抱任何敌对态度的国际主义。

假如这种說法是对的，那末“国际”当然已經被战争完全扼杀了；那末也就几乎沒有一位党内同志居然还能夸口說他是站在“国际”的立場上。因为，如果有一种使人們对之不能无动于衷而且簡直会迫使人們偏袒一方甚至热烈偏袒一方的事件的話，那末这种事件就是战争。甚至在中立国里，大多数同志也会决定支持交战双方中的这一方或那一方。中立永远只包含一种不以实际措施来表示任何偏袒的义务而絕不包含一种不以判断或願望来表示任何偏袒的义务。

毫无疑义：在战争中可能发生一种与国际主义不相容的偏袒态度。不过幸而并非任何偏袒态度都是如此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們抱这种态度的动机。

誰要是照这句话行事：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無論对不对，我都拥护我的国家——这样他就肯定会置身于“国际”之

外，即使他曾經置身于“国际”之中。

如果有人确定其态度时不从**本国的利益**出发而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整体**的利益出发，并且給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哪一方的胜利不仅会在本国而且会在全世界更有利地促进我們事业的进展，那末，情况就不同了。不管答案如何，它决不致损害国际主义的原则；国际主义的出发点是：一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无产阶级不能在一个国家里获得連續不断的进步，如果无产阶级在其他国家里退步的話。

但是国际团结絕不意味着：無論在何地，答案都必須是一律的。恰恰相反，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情况下能取得一致意見的事例迄今一直是十分罕見的。

简单地回顾一下迄今所发生的历次战争，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二 党在战争期間的分歧

1. 从一八五四年到一八六六年

自从拿破侖一世的时代以来，欧洲第一次战争是克里木战争（一八五四到一八五六年）。在那次战争中，神圣同盟完全解体了，这是俄罗斯、普魯士和奥地利三国政府間为了在整个欧洲压制民主而結成的联盟，这个联盟从一八一五年起一直到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的期間內决定着欧洲的政治。普魯士在克里木战争期間是对俄国保持忠誠的，奥地利的态度則搖擺不定，接近英法两国，而这两国则反对俄罗斯对土耳其的进攻。

当时，对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來說，态度似乎毫无疑义地已經确定了：即反对俄国，反对这个不久以前表明自己是最頑固地反对革命的俄国。尽管如此，当时就已出現以拉薩尔为一方，以馬克

思、恩格斯为另一方之間值得注意的分歧的萌芽，这个分歧一直到今天还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在“国际”中发生影响。拉薩尔把奥地利看成是欧洲民主进步的最大的障碍，馬克思和恩格斯則把俄罗斯看成是这种最大的障碍。

如果說这种分歧在一八五四年还只是偶而出現于机密函件中的話，那末，到一八五九年，矛盾就在小册子里尖銳地暴露出来了。这些小册子有一本是拉薩尔写的，有两本是恩格斯写的。虽然俄国当时还没有公然以奥地利的敌对者的姿态出現，但是拿破侖在对佛朗茨·約瑟夫宣战时已經与沙皇协同行动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站在奥地利这方面。他們对于他們所熟知的这个多瑙河帝国的缺点一直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們认为，作为对付俄国扩张的堡垒，这个帝国是不可少的。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一八六〇年）中，卡尔·馬克思指出：“从十八世紀中叶起，奥地利有理由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奥地利在东欧抵抗着俄国的前进，这种抵抗是无希望的，不彻底的，懦弱的，但是頑强的”。（見原书 77 頁）恩格斯在他的《波河和萊茵河》这本小册子里（一八五九年）說，意大利統一和独立的事业是值得寄予最热烈的同情的。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統治被认为是不能持久的。但是虽然如此，一旦奥地利不是同意大利一国打交道，而是同沙皇的奴僕拿破侖打交道——拿破侖想要解放意大利以便伸展到萊茵河左岸，人們就必須立即站在奥地利这一边。在那种情况下，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統治就具有“軍事障地”的意义，这种障地只有在人們不能守住的时候才会被放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問題立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从属于軍事問題；假如我們受到攻击，那末我們就要自卫。（原书 62 頁）

战事发生不久以后，恩格斯发表了名叫《薩伏依、尼薩城和萊茵河》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把保持德奥两国团結以对付拿破侖和沙皇的行动作为“民族运动”来进行辯护。

“我們中的一个受到了攻击，而且是受到第三者的攻击，这个

第三者与意大利毫不相干，但是它对于占领莱茵河左岸却兴致勃勃；面对着这个第三者——面对着路易·拿破侖，面对着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傳統——我們大家必須團結起来。人民的本能觉得要这样做，这个本能是对的。

“但是哥达自由派庸人多年以来根本就不再把德意志的奥地利看成是‘我們中的一个’。在他們看来，战争是值得欢迎的，因为战争可以削弱奥地利，从而有可能使小德意志帝国或大普魯士帝国终于出现。大批的北德庸俗民主派人士同他們联合在一起，指望路易·拿破侖会粉碎奥地利，然后使他們得以在普魯士的领导下把整个德意志统一起来。”（第4、5頁）

拉薩尔在他的《意大利战争和普魯士的使命》这本书里的說法与此完全不同。他认为，奥地利比俄国，比拿破侖专制政治更可恨：

“奥地利嗎？俄国是一个天生的野蛮国家，这个国家的专制政府只想在与它的专制利益不相抵触的限度內使俄国文明化。在俄国，野蛮会得到原諒，因为它是**民族的本质**。奥地利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奥地利政府是在与境内諸民族相矛盾的情况下奉行着野蛮的原則并且人为地用暴力来迫使文明民族屈服于它的”。（拉薩尔演讲論文集，伯恩施坦所編版本，卷一，第306頁）

他又說：

“奥地利就是一种頑固不化和彻头彻尾的**反动原則**。因此从它存在之日起，奥地利就是一切自由思想最危險的敌人。路易·波拿巴本人是一个专制帝王，一个暴君。但是，他不得不使他的統治所依賴的而且不断一再加以宣揚的那些**原則**，却是民主的”。（第310頁）

德国对法国的进攻性战争，即使最初只是对波拿巴主义发动的，但在拉薩尔看来，也是“文明历史上的不幸”：

“两大文明民族——德国人和法国人間的和睦友善，是一切政治自由、欧洲的一切文明进步、精神理想上的任何发展和实现，簡